延安中國女子大學婦女幹部的培養

王詩穎*

摘 要

1939年7月20日延安中國女子大學在毛澤東的倡導下成立，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第一所專門培訓婦女幹部的學校。女大的成立主要是為了解決抗戰時陝甘寧邊區政治、經濟和安全等問題。在戰時的動員政策下，女大的學校體制和課程設置反映出中共社會性別的概念，與戰時的婦女參戰動機相違背。這些投身女大幹部培訓的婦女，不僅只是降伏於中共的社會性別化分工的概念之下，她們當中的一部份有機會涉足於地方政治的參與。這是婦女投身女大的主要動機，也是婦女能夠在其中獲得較多自身利益的地方。

關鍵詞：抗戰、婦女幹部、幹部教育、動員政策、社會性別、延安中國女子大學

*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生

一、前言

清末民初平等觀念與女權運動興起，提倡「婦女救亡」、「婦女走出家庭」，女性逐步走入公領域，始將婦女關聯到國家和救亡的任務上，亦即婦女也負有救亡救國的責任。從表面上看起來婦女似乎從傳統家庭的禁錮中走出，但另一面來說，卻是走進了國家整編的國民行列中。抗日戰爭爆發後，國家面臨到救亡圖存的急迫，此時共產黨如何動員婦女，將婦女整編到國家的行列中，婦女和政黨二者如何產生關係？在此問題意識下探討中國共產黨創辦的第一所專門培訓婦女幹部的延安中國女子大學具有一定的歷史意義。

世界上的任何事情要是沒有女子參加，就做不成氣。我們打日本，沒有女子參加，就打不成；生產運動，沒有女子參加，也不行。無論什麼事情，沒有女子都絕不能成功。¹

這是毛澤東在 1939 年「三八」婦女節紀念大會上的談話「打日本」、「生產運動」等言詞，說出中共將婦女的重要性關聯到國家與救國的任務，並且將婦女力量提高到決定抗戰勝利的重要性上。當然，中共也了解，婦女雖然有力量卻還需要加入自己的組織。同年 6 月，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就指出婦女幹部培養的重要：

我們歷來最缺少的幹部是婦女幹部，婦女運動經驗亦沒有總結，這個缺點必須補救。沒有一批能幹而專職的婦女工作幹部，要開展婦女運動是不可能的。²

在毛澤東的倡導下，同年 7 月 20 日延安中國女子大學（以下簡稱女大）成立，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第一所專門培訓婦女幹部的學校。女大在兩年又兩個月的時間裡（1941 年女大與陝北公學、澤東青年學校合併為延安大學），培養出近千名的婦女幹部。

女大的創辦固有其時代特殊需要，但對於戰時位於陝甘寧邊區的中共何以如此急迫？這也許可從馬克·塞爾登（Mark Selden）在

¹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頁 166-171。

² 同上註，頁 225。

《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所用以分析共產黨人能夠對因戰爭而惡化的農村問題做出回應。塞爾登解釋中共在抗戰時期如何成功獲得了民眾的廣泛支持，而他們之所以能動員廣大農民起來抵抗日軍的侵略，原因在於他們有效地將行政措施與社會改革緊密結合起來。³顯然，民眾的支持對人民戰爭的共產主義戰略是至關重要的，而地方婦女的支持更是不可或缺。動員戰佔人口半數的婦女群眾則成為中共解決戰時政治、經濟和安全問題新方法的重要環節，而女大的創辦則是此需要的落實。透過這批婦女幹部深入婦女群眾中動員廣大婦女，使中共能夠獲得更廣泛的支持和力量。

本文還將討論中共的動員政策和女大學員利益之間的動力關係為何？什麼是那些投身女大幹部培訓的婦女的動機和期望？而中共在此時期的性別政策為何？筆者運用史明（Nicola Spakowski）在〈一九三〇至一九四〇年代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婦女的軍事參與：吸納和排斥的模式〉中的討論，探討婦女的參戰動機和中共的性別政策。⁴史明認為，婦女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軍事參與，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區有其參戰動機的差異。1930年代早期的蘇區，年輕的農村婦女參軍以逃離壓抑的家族組織，1937到1945年的抗日戰爭，年輕的城市婦女則因愛國熱情的鼓舞，奔向中共在延安的根據地。而中共則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中對革命的不同傾向，形成對婦女參戰的吸納和排斥的多樣性模式。筆者認為，中共利用抗戰初期陝甘寧邊區的穩定情勢，進行的各項改革和制度，尤其是中共在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後，在陝甘寧邊區推行的選舉制，迎合了當時大多數人的意願。女大幹部中，一部份到地方進行群眾工作，一部份則在畢業後得到參與選舉的機會。⁵

關於女大的歷史為本文的研究主體，目前所知專門的研究著作

³ 馬克·塞爾登（Mark Selden）著，魏曉明、馮崇義譯，《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北京：北京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頁262。

⁴ 史明（Nicola Spakowski）著、許曼譯，〈一九三〇至一九四〇年代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婦女的軍事參與：吸納和排斥的模式〉，收入《共和時代的中國婦女》（台北：左岸文化，2007），頁130-157。

⁵ 見本文第四部份的討論。

不多，相關的論文研究僅僅數篇，論述內容流於介紹性的呈述，且多受到意識形態的限制。⁶然而，有關女大的研究資料還是可以從許多回憶錄或自傳中取得，如周國全、郭德宏、李明三的《王明評傳》⁷以及曹仲彬、戴茂林的《王明傳》。⁸中共中央於1939年7月創辦了中國女子大學，當時在中共中央分管婦女工作的王明（原名為陳紹禹）被任命為女大校長，從他的傳記當中可以了解當時女大內部的情形；在中共黨史研究中，也有不少女大學生的回憶錄文章，如毛澤東的私人攝影師侯波，就曾經就讀於女大，其口述回憶錄中特別有一章〈侯波：我的大學〉，描述了當時在女大就學的情況；⁹中國第一位女大使丁雪松也是女大的畢業學生，當時還擔任了女大的校友會副主席和俱樂部主任，接觸到大批女學員；¹⁰在蘇小環所編《50位中國女性的人生自述》中，也留下了幾篇女大學員的回憶文章。¹¹

整體而言，尚未有人對女大做全面性的研究和討論。因此，我們若能透過中共在抗戰時期的婦女動員政策中，觀察到中共的性別政策以及婦女投入的動機和期望，從而析論這所由毛澤東所倡導、共產黨第一所專門培養婦女幹部的女子大學，則其歷史定位將更為突顯。本文便以此問題意識作為研究主軸，在此主軸下探討女大的學校體制、學校教育以及婦女幹部的工作。

⁶ 以女大為研究主體的論文有：梁怡，〈中國女子大學的成立〉，《中共黨史資料》（1992）；梁怡，〈延安女子大學評介〉，《抗日戰爭研究》，3期（1999），頁91-104；劉霞，〈毛澤東與中國女子大學〉，《黨史文苑》，6期（2005），頁16-17。

⁷ 周國全、郭德宏、李明三，〈在延安中國女子大學〉，《王明評傳》（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頁379-384。

⁸ 曹仲彬、戴茂林，《王明傳》（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

⁹ 侯波、徐肖冰口述；劉明銀整理，《帶翅膀的攝影機：侯波徐肖冰口述回憶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75-86。

¹⁰ 丁雪松口述；楊德華整理，《中國第一位女大使：丁雪松回憶錄》（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

¹¹ 蘇小環編，《50位中國女性的人生自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二、抗戰局勢與婦女動員

(一) 抗戰初期的陝甘寧邊區與婦女動員政策

中共所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立後，依 1937 年 9 月 22 日公佈的「共赴國難宣言」中提出四項保證之一即「取消現有的蘇維埃政府」，但在抗戰期間卻相繼建立若干「邊區政府」。「陝甘寧邊區」是中共 1937 年 9 月建立的，是原來陝甘蘇區的演變。¹²此時期，相較於中共在江西時期的局勢，陝甘寧的經歷在戰時根據地裡是別具一格的。它享有相對穩定的局面，其他根據地則戰鬥頻繁。1937 年 9 月太原戰役後，毛澤東更特別強調「獨立自主的山地作戰」，即共軍除絕對必要的小規模戰鬥外，應盡量分散，並針對廣大農村人民的抗日自衛需要，從事動員和組織的工作。¹³因此，抗戰期間陝甘寧邊區政治動員的繼續與農村生活具體問題密切相關，並且戰時動員經常強調的是愛國主義和捍衛國家而不是階級問題。¹⁴隨著陝甘寧邊區情勢的穩定，邊區各項政策也開始展開。1937 年春實行的選舉和行政機構改革，激發了地方人民的政治熱情，也迎合了受愛國熱情鼓舞的人民的意願。

1939 年國共關係開始交惡，陝北邊區在這一年的財政收入中，仍有 86% 的部分來自國民黨外援。¹⁵翌年 10 月，國民政府中止撥款，這十個月來陝甘寧邊區從國民政府得到的收入仍然佔這一整年財政收入的 74.4%。¹⁶然而國民政府在中止撥款前後，加強經濟封鎖，切斷陝北邊區的任何對外貿易。這使得中共的財政收入因而銳減，但所供養的黨政軍脫產人員卻越來越多。中共為了解決財政困難，採取了一連串的政策，例如實行精兵簡政，嚴格限制脫離生產幹部的人數，提倡軍隊學校機關單位的生產節約，指派大批軍隊屯

¹² 蔡國裕，《中共黨史—延安時期》第2冊（台北：國史館，1990），頁103。

¹³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冊（台北：聯經出版社，1998），頁333。

¹⁴ 馬克·塞爾登（Mark Selden），《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頁123。

¹⁵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冊，頁348。

¹⁶ 同上註。

墾等。¹⁷因此，從事動員和組織的工作則成了中共當前尋求穩定要解決的問題。

抗日戰爭為共產黨軍隊開闢了一條新的陣線，抗日聯合陣線的概念還用於社會團體：農村和城市的中國人，男人和女人都應該為保衛國家民族而貢獻力量。婦女運動是中共四大群眾運動之一，而中共亦可說是由群眾運動起家的。¹⁸中共的婦女運動的理論，主要根據於馬克斯、恩格斯的婦女解放說，即婦女的解放只有在婦女大量參加生產事業，而家中工作僅佔她們很少時間的時候才有可能。¹⁹列寧和史達林關於婦女運動策略思想，也是中共婦女運動理論的重要來源。列寧認為：

在婦女從事於家務之下，她們的地位始終是受壓迫的，要使婦女達到完全的解放與男性真正的平等，則需要社會經濟，需要婦女參加一般的勞動，那時候婦女將會站到同男性相同的地位。²⁰

不僅列寧重視婦女參加生產勞動，史達林也同樣視勞動婦女為群眾運動中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他認為勞動婦女、女工和農婦都是工人階級的後備軍：

這一後備軍代表著整個人口的半數。婦女後備軍擁護工人階級抑或反對它，關係著無產階級運動的整個命運，關係著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與失敗。因此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共產黨的第一個任務，就是為從資產階級影響下徹底解放婦女，即女工和農婦；為在無產階級旗幟下，對女工和農婦進行政治

¹⁷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冊，頁349。關於中共此時期的精兵簡政，可參見劉益濤編著，《毛澤東與延安時期精兵簡政》（西安：陝西人民教育，1993），內有此時期毛澤東關於精兵簡政的發表。

¹⁸ 林公文，〈中共的婦女運動〉（台北：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1975）。中共的四大群眾運動為婦運、農運、工運及青運。

¹⁹ 林公文，《中共的婦女運動》，頁12。

²⁰ 同上註，頁15。原文參見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籌備委員彙編，《馬恩列史論婦女解放》（香港：香港民主出版社，1949），頁1-4。

教育與組織工作而堅決鬥爭。²¹

由此，可看列寧和史達林對婦女解放的理論，全是從生產勞動為出發點。因為婦女佔人口的半數，是一項很大的勞動資源。而中共要穩固其在陝甘寧邊區的情勢，勢必需要這佔人口半數的婦女群眾作為基礎。

中共的婦女工作，在抗戰前，因主要對象限於大城市的少數產業女工及蘇區的部分農婦，故使其工作未具規模；到了抗戰時期，中共策略路線轉變，以爭取廣大婦女群眾作為中共的群眾運動的中心工作之一，經過 1939 年中共中央書記處《關於開展婦女工作的決定》，²²更確定婦女工作作為中共各級重要工作之一。

（二）婦女幹部培養的需求

1937 年 9 月，中共發表了《婦女工作大綱》，開頭就提出「以動員婦女力量參加抗戰，爭取抗戰勝利為基本任務。」²³抗戰初期，中共便認識婦女參戰的重要性，並以此為抗戰時期婦女工作的首要工作，將抗戰勝利連結到婦女參加抗戰的問題上。然而，要動員廣大的婦女，並在其中建立婦女工作，則需要專門的婦女幹部。在工作大綱中，發表宣傳教育問題上，也提出了對於婦女幹部培養的重視：「培養大批黨的與群眾的女幹部，來迎接抗戰新階段工作的開展，是我們婦女工作的中心一環。」²⁴在此中共首先提出了對於婦女幹部的培養重視。1937 年 10 月，毛澤東在《目前抗戰形勢與黨的任務報告提綱》中，首先分析了目前抗戰的形勢，最後的目標是要建立全中國的強固的共產黨，此時期中共的幹部政策：「目前幹部的恐慌，加強對幹部的教育、培養與提拔，“幹部決定一切”。」

²¹ 史達林，〈國際婦女節〉，引自《馬恩列史論婦女解放》（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頁39-40。轉引自林公文，《中共的婦女運動》，頁18-19。

²² 中國婦女管理幹部學院編，《中國婦女運動文獻資料彙編1918-1949》第1冊（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87），頁346-353。

²³ 同上註，頁335。

²⁴ 同上註，頁338。

²⁵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又發表了《關於大量發展黨員的決議》，視為「黨目前迫切與嚴重的任務」。²⁶同年10月15日，洛甫在六中全會上的報告提綱《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與黨的組織問題》中，更是將中共目前對於幹部問題做了六大點的指示。²⁷1939年2月20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發表了《關於開展婦女工作的決定》，要求「用各種方法解釋婦女大眾在抗戰建國及將來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要作用」、「注意於女黨員的吸收及女幹部的培養」，²⁸都強調了抗戰時期婦女參戰和婦女幹部培養的重要。同年的3月3日，中共中央婦女運動工作委員會發出一封具有指導性文件的《關於目前婦女運動的方針和任務的指示信》，提出了關於婦女運動中關於統戰、組織、教育、生活、婦女地位等五方面的工作意見，其中之一是要求為婦女大眾提供免費的教育機會：

要動員婦女抗戰，要達到婦女解放，必須提高他們的文化水準、政治覺悟和培養她們的工作能力。一方面向政府機關和民眾團體建議，要求給婦女大眾建立免費教育的學校；盡可能的在各種實際工作中培養與提拔婦女幹部和領袖。利用一切機會灌輸抗戰常識、社會科學、防空防毒、醫藥衛生、救護保育等常識；同時必須盡可能地使婦女受職業教育，婦女受武裝訓練，學習射擊等等。²⁹

而在進行上述婦女工作中，必須注意：

首先動員和組織知識界的婦女及女學生，培養和訓練她們成為婦運的幹部，使她們不僅成為在婦女知識分子中進行工作的主力，而且成為到女工、農婦及家庭婦女中去工作的橋樑

²⁵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文集》第2卷，頁60。

²⁶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頁466。

²⁷ 同上註，頁704-708。

²⁸ 中國婦女管理幹部學院編，《中國婦女運動文獻資料彙編1918-1949》第1冊，頁346。

²⁹ 同上註，頁349。

和先鋒。³⁰

指示信的最後，特別強調：「有計畫、大批的培養、提拔和愛護黨和非黨的婦女幹部，是解決一切困難的樞紐。」³¹這封指示信是經過中共中央書記處討論過，是中共中央在抗戰時期對婦女工作的指導性文件。在這封指示信中，發表了中共培養婦女幹部明確性的指示和動員的對象。而其欲培養的婦女幹部，則需要具備「抗戰常識」、「社會科學」、「防空防毒」、「醫藥衛生」、「救護保育」、「武裝訓練」、「學習射擊」等常識。婦女是參與抗戰，但主要還是被安排在輔助性的位置上，但這些位置被看作革命的一個重要部分。

中共自 1921 年以來，就相當重視幹部訓練和教育的工作，而成立黨校則是教育黨員和培養幹部的重要措施之一。³²1923 年冬，任弼時、任岳、劉少奇等在安源創辦了黨校。1925 年 9 月，又籌辦了北京黨校，培養了一百多位學員。學員經過短期學習以後，被分派到其所屬各地單位負責各方面的工作。³³此後，在不同時期，中共都有立即辦黨校、成立講習所、成立幹部學校、辦幹部訓練班等舉措，為了應付各種不同的形勢需要。為了加強對幹部教育的領導，中共陸續發布了《延安在職幹部教育暫行計畫》、《關於幹部學習的指示》、《關於辦理黨校的指示》、《關於在職幹部教育的指示》、《關於延安幹部學校的決定》、《關於在職幹部教育的決定》等一系列的文件，成立了幹部教育部和幹部教育委員會。³⁴為了實施幹部教育，尤其是婦女幹部的培養，在毛澤東的倡導下，1939 年 7 月 20 日延安中國女子大學成立，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第一所專門培訓婦女幹部的學校。

³⁰ 同上註，頁350。

³¹ 同上註。

³² 王仲清，《黨校教育歷史概述1927-1949》（北京：中共中央黨校，1992），頁6。

³³ 同上註。

³⁴ 張豈之、史念海、郭琦編，《陝西通史》革命根據地卷（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1998），頁223-224。

三、動員婦女政策下的女大

(一) 辦學宗旨與婦女投身動機

中共為加強對婦女運動的領導，利用一切可能的條件，在各抗日根據地大量培養婦女幹部。其途徑有二條：一是各抗日根據地各級婦女救國會、婦女會等組織開辦短訓班，培訓鄉村農婦幹部，這是主要途徑；二是八路軍、新四軍、各地方武裝部隊以及根據地抗日民主政府創辦的軍事院校、黨校、專業學校等培訓中、高級婦女人才。³⁵事實上，在女大成立前，婦女幹部的培養工作就已經展開，1937年邊區開辦了抗日軍人家屬學校、邊區助產訓練班等，主要對婦女進行文化和職業教育。早於女大開辦的中央黨校、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等也招收了數量不等的女學員，其中抗日軍政大學和陝北公學因女學員人數較多，都單獨編有女生大隊。³⁶在此基礎上，1939年7月20日在毛澤東的倡導下成立的中國女子大學，它可說是第一所規格最高且規模最大的婦女幹部培養學校，也是中國共產黨第二條婦女幹部培養途徑的體現。

女大創建於抗日戰爭的陝甘寧邊區中，校址在延安楊家嶺與王家坪之間的山坡上。1939年3月，動員了當地200多民工施工了一個半月，修建起了三座簡陋的教室和一個簡易的大禮堂，開鑿了100多孔新窯洞，於5月開始接收學員。³⁷7月22日，在延安中央黨校大禮堂舉行了開學典禮，毛澤東在開學典禮中的演講指出：

女大的成立，在政治上是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它不僅要培養大批有理論武裝的婦女幹部，而且要培養大批做實際工作的婦女運動幹部，要準備到前線去，到農村工廠去，組織二億

³⁵ 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中國婦女運動史：新民主主義時期》（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頁412-416。

³⁶ 王健民，〈陝甘寧邊區〉，《中國共產黨史》第3編延安時期（台北：漢京文化，2002），頁270-285。

³⁷ 梁怡，〈延安女子大學評介〉，頁93。

三千五百萬婦女參加抗戰。³⁸

這是女大辦校的方針，為了準備一批婦女幹部，「到前線和農村工廠中，組織婦女參加抗戰」。這些婦女幹部作為國家發動婦女參加抗戰的一批人，在黨國動員下，是「動員群眾婦女」的婦女幹部。同時，毛澤東還提出：「全國婦女起來之日，就是中國革命勝利之時。」³⁹這批婦女幹部不僅被國家作為動員婦女群眾的人才，也是連結抗戰勝利和救國任務的一份子。

女大的辦校宗旨在校長王明的開學典禮大會上的報告中更為明確：

一般的講，女大要培養的是為民族解放、為社會解放、為婦女解放而奮鬥的婦女幹部。特殊的講，女大要培養的是能在抗戰建國時代忠誠獻身於婦女解放運動的婦女幹部。因此，女大以培養抗戰建國的婦女幹部人才為宗旨；以養成具有革命理論基礎、革命工作方法、婦女運動專長和相當職業技能等抗戰建國知識的婦女幹部為目的。⁴⁰

王明（本名陳紹禹）1938年從莫斯科回國，任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1938年底，從重慶回到延安，被任命為中央統戰部部長和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主任，還擔任了中央南方工作委員會主任。女大的辦校宗旨，即為了服務抗戰時期的黨國需要，並以培養專門的革命人才為宗旨。而女大的辦校目的，在王明的報告中也明確指出：

女大創辦的第一個原因，是為了適應抗戰建國大時代的需要；女大開辦的第二個原因，是根據婦女運動的特點；女大辦校的第三個原因，為的是使中國婦女運動起一個歷史的轉變；最後，女大創辦的第四個原因，是為了特別提高婦女的

³⁸ 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中國婦女運動史：新民主主義時期》，頁414。

³⁹ 同上註。

⁴⁰ 延安中國婦女社編，〈王明同志在中國女子大學開學典禮上的報告〉，《中國婦女》，1卷3期(1939)，頁4。

地位。⁴¹

女大的一切工作都是圍繞此辦校宗旨和目的而進行的，在這個辦校目的中，第一個目的就是為了「適應抗戰建國的時代需要」，為了動員大多數的婦女參戰，婦女幹部的人才培養是有時代需要的。最後一個目的則是為了「提高婦女地位」，在黨國動員下，動員大多數的婦女的身分，被提高成為和男性同等的地位，共同接受教育、政治訓練，以達到適應抗戰建國的時代需要。

在上述報告裡，不斷強調女大創辦的目的是為了「組織二億三千五百萬婦女參加抗戰」，培養的婦女幹部更是「到前線去」參與抗戰。這激勵了抗戰時期那些投身女大的婦女群體。女大的學員編制上，學員來自 22 個省，其中包括一名台灣人。學員中的一部分人由中共中央黨校、抗日軍政大學轉來；一部份是陝甘寧邊區和各地方組織選派的，包括一些長征幹部。⁴²學員的平均年齡在二十歲左右，從創辦以來到 1941 年秋結束，共辦兩期，每期學習一年至一年半。女大將學員按程度和類型分四種班次，第一學期共有五個普通班和一個高級班（培養政治文化水平較高的幹部）；一個特別班（培養長征來的婦女幹部）；一個陝甘班（培養陝北地方婦女幹部）。第二期增加到十二個班，包括八個普通班，二個高級班，一個陝甘班，一個特別班，學生增加到一千多人。⁴³學員的背景，知識份子佔 80% 以上（整體的教育程度，中學程度佔 70%，大學程度佔 10%），工人佔 10%，農民佔 6%，其他佔 4%。普通班學員以抗大女生隊為基本學生，她們主要學習基本的革命理論。特別班的學員主要是長征幹部或大城市的女工。參加過陝甘寧邊區土改基層女幹部 50 餘人被編成陝甘班。特別、陝甘兩班的學員要額外學習文化知識，主要為培養有婦運經驗的工農婦女幹部。高級研究班的學員是從普通班的學員中通過考試錄取的，著重培養有較高的馬列

⁴¹ 延安中國婦女社編，〈王明同志在中國女子大學開學典禮上的報告〉，頁 2。

⁴² 同上註，頁 4。

⁴³ 西北五省區編纂領導小組，中央檔案館編，〈陝甘寧抗日民主根據地〉回憶錄卷，頁 467。

主義理論水平的女幹部。⁴⁴

這批學員中，知識份子佔 80%以上，且一部份是從中央黨校和抗日軍政大學中轉來的。這批婦女投身女大的動機，多受愛國熱情的鼓舞，他們認為中國共產黨是作為真正愛國力量的形象，此孕育了她們加入運動的期望。⁴⁵大體而言，這批婦女的觀點是愛國的，但她們對於作為中共運動的指導原則和理論來源，即馬克斯列寧主義沒有深刻的瞭解，也對作為中共群眾運動之一的婦女運動不感興趣。⁴⁶她們是受到愛國精神的感召和鼓舞，而自願成為女大的一份子。⁴⁷在抗戰期間，婦女「戰鬥的權力」的問題被突顯了出來，她們當中的許多人想到前線去參加戰鬥。⁴⁸1937年9月，中共發表了《婦女工作大綱》中，婦女是被動員去做直接和戰鬥相關的工作，⁴⁹但到了1939年之後在《中央婦委關於目前婦女運動的方針和任務的指示信》中，對於婦女的角色分配中社會性別化程度更加明確，中共看重的是婦女的生產工作和貢獻。⁵⁰彭德懷在1941年6月15日〈寫給《華北婦女》〉中也說到：

我想，參加婦女工作這本是婦女的天然責任。婦女不作婦女工作，那我們應把這個工作留給誰做呢？婦女解放雖然不能

⁴⁴ 延安中國婦女社編，〈王明同志在中國女子大學開學典禮上的報告〉，頁4。

⁴⁵ 她們之中的許多人讀了Edgar Snow的《紅星照耀中國》而受了激勵，這是當時瞭解共產主義者的主要資訊來源。參見史明(Nicola Spakowski)著、許曼譯，〈一九三〇至一九四〇年代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婦女的軍事參與：吸納和排斥的模式〉，頁149。

⁴⁶ 關於共產主義的婦女運動原則和理論，可參考本文頁4-5，詳細可參見林公文，〈中共婦女運動的理論根源〉，《中共的婦女運動》，頁1-20。

⁴⁷ 可參見女大學員的回憶錄和自傳，如侯波、徐肖冰口述；劉明銀整理，《帶翅膀的攝影機：侯波徐肖冰口述回憶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75-86；丁雪松口述；楊德華整理，《中國第一位女大使：丁雪松回憶錄》（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頁261-264；蘇小環編，《50位中國女性的人生自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頁25-28；西北五省區編纂領導小組，中央檔案館編，《陝甘寧抗日民主根據地》回憶錄卷，頁450-469。

⁴⁸ 史明(Nicola Spakowski)著、許曼譯，〈一九三〇至一九四〇年代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婦女的軍事參與：吸納和排斥的模式〉，頁149。

⁴⁹ 中國婦女管理幹部學院編，《中國婦女運動文獻資料彙編1918-1949》第1冊，頁335。

⁵⁰ 同上註，頁346。

與工人階級和民族解放分開，但也不能與兩者混同。⁵¹

結果，農村婦女中的群眾工作成為中共群眾運動的一個重心，被交付到被認為是婦女的自然領域的婦女運動的手上。但知識份子很不情願的被安排去做婦女運動的幹部，因為這和她們最初能夠參戰的預想不同。而且這還是一個令人輕視的工作：⁵²

用各種方法解釋婦女大眾在抗戰建國以及將來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要作用，堅決消滅黨的一切組織與黨員對於婦女及婦女運動所存在的那種陳舊的、庸俗的及中世紀的態度的各種殘餘，糾正一切對於婦女工作的輕視、忽視與消極的態度。⁵³

這些婦女不得不把她們的軍事理想轉向為群眾工作，尤其是婦女運動的思想再教育。⁵⁴女大的成立即在中共的社會性別化下開展，⁵⁵許多女學生更從具軍事目的的抗大轉學來女大。儘管女大的生活是軍事化的，學生也接受一些軍事訓練，但畢業生們並不被分配做軍事服務工作，而是投入地方的生產、農村婦女的教育和婦女動員等輔助角色的工作。⁵⁶筆者認為，婦女投身女大的動機不僅只是降伏於中共的社會性別化分工的概念，而是有其他的利益取向。這些女大幹部在畢業後，一部分將進行中共的群眾工作，一部份則有機會涉足於地方政治的參與。

⁵¹ 中國婦女管理幹部學院編，《中國婦女運動文獻資料彙編1918-1949》第1冊，頁495。

⁵² 史明(Nicola Spakowski)著、許曼譯，〈一九三〇至一九四〇年代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婦女的軍事參與：吸納和排斥的模式〉，頁150-151。

⁵³ 中國婦女管理幹部學院編，《中國婦女運動文獻資料彙編1918-1949》第1冊，頁346。

⁵⁴ 史明(Nicola Spakowski)著、許曼譯，〈一九三〇至一九四〇年代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婦女的軍事參與：吸納和排斥的模式〉，頁151。

⁵⁵ 關於社會性別化的解釋，筆者採用高彥頤在《閩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中，對社會性別的解釋：「社會性別是一種文化建構：男、女在角色、行為、腦力和情感方面的區別，是通過一個社會發展而形成的。」轉引自高彥頤(Dorothy Ko)，《閩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頁5。

⁵⁶ 女大學員畢業後一部分擔任輔助性角色的社會性別化下的工作，如護理人員、幫助農村婦女識字的掃盲員；另一部分學員則有機會涉足政府單位的中高階級幹部。

（二）學校體制中的性別等級

抗戰期間中共的動員政策，基本上遵循職責的社會性別化分工的概念，也就是男性被動員去加入八路軍和新四軍，婦女應該擔當輔助角色，並在地方防衛和生產工作中取代男性。抗戰期間的共產主義政策，大致回歸到 30 年代早期的取向，給那些被認為是婦女天生的活動領域的輔助性角色和政治工作，附加上了高度的重要性。然而，和 30 年代早期不同的是，動員政策變的越來越規範化，並且朝著關於社會性別和社會背景更明確的角色分配的概念演進：農村婦女被作為動員的主要目標，被安置在有著城市背景的女幹部的掌控中。⁵⁷

中共在延安時期的教育制度就其性質而言，可分為幹部教育、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等三大類，而這三大類教育的基本狀況又可分為在職幹部教育、幹部學校教育和高級幹部學校，女大則屬於最後一類的教育基本狀況，專門培養抗戰時期的人才為目的。⁵⁸中共延安時期的幹部教育、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其行政組織系統，三類各不相同；而同類教育的隸屬關係，彼此亦有出入。幹部教育的行政組織系統，有隸屬於中共中央，也有隸屬於邊區政府，亦有由各部隊、各軍區、各級黨委直接舉辦的，系統至為混亂。然而，大體上係以直隸於中共中央為主，隸屬於邊區政府及各部隊、各軍區為者為輔，女大則直隸於中共中央文委。⁵⁹

學校的最高領導機構是校務委員會，校務會直接對校長負責。第一任校長由中央統戰部部長、中央婦委書記王明親自擔任；副校長是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柯慶施。校務會下設：教務處、政治處、秘書長和總務處。張琴秋為教務處長、孟慶樹為政治處長、郭靖任秘書處長、吳朝祥任總務處長。⁶⁰全校共有處級幹部 8 名，其中 5 名是早期中共黨員、留蘇學生，2 名是長征幹部，1 名在抗戰前是大

⁵⁷ 史明 (Nicola Spakowski) 著、許曼譯，〈一九三〇至一九四〇年代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婦女的軍事參與：吸納和排斥的模式〉，頁 155。

⁵⁸ 汪學文，〈延安教育的制度與政策〉，《匪情月報》，14 卷 7 期 (1971)，頁 1。

⁵⁹ 同上註，頁 3。

⁶⁰ 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中國婦女運動史：新民主主義時期》，頁 415。

學生、地下工作者。⁶¹

這樣一所名為延安中國女子大學，為要培養共產黨婦女幹部的學校，仍是以男性為領導主體，她們的工作受到男性領導的監管。在此問題意識下，探討校務人員對於婦女的看法，可以對女大的學校體制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認識。

王明在《一九四〇年的展望》中，就發表了其對於婦女的一些看法：

在一九四〇年這個偉大世界事變和偉大中國事變的年度中，婦女將起著特殊重大的作用……在中國，母親對於兒子，妻子對於丈夫，姊妹對於兄弟，姑嫂對於姪輩，將努力號召他們積極參加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民族解放戰爭，將號召他們參加到抗戰軍隊裡去，參加到抗日游擊隊中去，參加到一切有利於抗戰事業的工作中去，將號召他們堅持抗戰到底……將鼓勵他們為中華民族的生存獨立而英勇奮鬥英勇犧牲，以求得最後戰勝敵寇的勝利。⁶²

在王明的文字中，婦女的特殊作用在於「號召男性到抗戰中」、「號召男性奮鬥犧牲」，為的是最後抗戰的勝利。婦女是作為黨國號召男性的工具，在此身分下婦女的地位被黨國提高，並且再一次的複製傳統性別制度的核心觀點。對於女大要培養的婦女幹部，身為校長的王明在女大的開學典禮上，明確的說到女大要培養出來的人才，應該具備兩方面的特點：

一方面，我們是不倚賴男子，獨立生活，獨立工作，獨立鬥爭的能力的革命女性。另一方面，我們是新時代的新賢妻良母新孝女的模範……中國所需要的新賢母，應該是教子精忠報國的岳母一類傑出的人物；新賢妻應該是能在前線助戰的□夫人（梁紅玉）一流超群的幹材；新孝女應該是能夠代父從

⁶¹ 梁怡，〈延安女子大學評介〉，頁94-95。

⁶² 延安中國婦女社編，〈一九四〇年的展望〉，《中國婦女》，1卷1期(1939)，頁3。

軍的花木蘭式的女英雄。⁶³

身為女大的校長，對於婦女幹部直接視為「岳母」、「梁紅玉」、「花木蘭」等「新時代的新賢妻良母新孝女」的模範。依照王明的看法，婦女仍被認知作為男性輔助的身分，應該要「教子」、「助戰」、「代父從軍」。這些男性共產黨人，仍舊保持了一些對性別角色的傳統期待。她們的職責被認為是女性做為母親和家庭主婦的傳統角色的延伸，「教子」、「助戰」等輔助者、贍養者。這些傳統的性別刻畫特別表現在女大的課程設置和活動工作上。

張琴秋不僅是女大的教務處長，還是中共中央婦運委員會委員，其對於婦女的看法，甚至影響了整個婦女運動和中共婦運委員會的走向。張琴秋在《中國婦女》中發表了一篇關於〈中國婦女片段生活的回顧〉，是對於蘇維埃政權下婦女爭取權利和生活的回顧。當中，她發表了對於黨和婦女的一些看法：

凡是男子能做的事，女子亦都能做，凡是男子所享有的權利，女子都能享受。她們所以能夠獲得這種權利的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由於長期鬥爭的結果，而另一方面，則是由社會主義的國家制度中所取得的……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政權，婦女才能獲得。⁶⁴

張琴秋認為，婦女權利的獲得，必須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達到，亦即先有黨後才有婦女。其對於黨和婦女的關係是很明確的，婦女只有在黨國領導下，才能「享有男子所享有的權利。」當這些女共產黨人把婦女解放和政黨聯繫起來時，不由自主的就把婦女的地位下降為組織者和管理者，這些角色看起來與她們的實力自我形象相匹配。⁶⁵

⁶³ 延安中國婦女社編，〈王明同志在中國女子大學開學典禮上的報告〉，頁4。

⁶⁴ 延安中國婦女社編，〈中國婦女片段生活的回顧〉，《中國婦女》，1卷7期(1940)，頁6。

⁶⁵ 柯臨清 (Christina K. Gilmartin) 著、宋少鵬譯，〈共產黨早期組織中的性別與性別政治〉，收入《共和時代的中國婦女》(台北：左岸文化，2007)，頁110。原文發表於 Christina K. Gilmartin, "Gender in the Formation of a Communist Body Politics,"

孟慶樹任女大的政治處長，同張琴秋一樣是中央婦運委員會委員。此外，孟慶樹還是女大校長王明的妻子。其在延安各界婦女大會上的演講中，對於抗戰時期的婦女工作問題提出明確的看法：

目前中國革命特殊階段……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階段的基本任務……堅持抗戰到底爭取最後勝利，就是婦女運動的主要任務。婦女要環繞著這個中心任務來決定自己的工作方針，參加抗戰建國各方面的工作。目前婦女運動的第一個特點就是把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婦女本身的利益放在第二位。⁶⁶

在孟慶樹的演講詞中，認為抗戰時期婦女的主要任務就是「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而此任務圍繞著婦女的工作方針，將婦女的工作關聯到國家與救國的任務中，並且將婦女力量提高到決定抗戰勝利的重要性上。而這個工作的特點，就成了「民族利益第一、婦女本身利益第二」的順序。

我們從女大校長王明、教務處長張琴秋、政治處長孟慶樹的發表和演講當中，看到他們對於婦女本身和婦女運動以及婦女幹部的一些看法。他們對於婦女都有高度的重視，然而目的是為了適應抗戰建國的需要。雖然他們一面強調婦女必須成為「如鋼如鐵」的男子，但另一面也要求婦女作為「新時代賢妻良母孝女」的模範。我們若要瞭解抗戰時期中共對於婦女的性別角色的傳統期待，以及中共的性別政策，可以從女大的課程設置和活動工作中有進一步的認識。

（三）課程設置中的性別機制

1937年8月25日，毛澤東在《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中，提出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其中第八綱領就提出了抗日的教育政策：「改變教育的舊制度舊課程，實行以抗日救國

Modern China (1993)。

⁶⁶ 解放週刊社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婦女運動〉，《解放週刊》，54期（1938），頁11。

為目標的新制度新課程。實施普及的義務的免費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覺悟的程度。實行全國學生的武裝訓練。」⁶⁷隔年 11 月，毛澤東在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做《論新階段》的報告，強調要「實行抗戰教育政策，使教育為長期戰爭服務。」此報告中，毛澤東還強調：「偉大的抗戰必須有偉大的抗戰教育運動與之相結合，兩者間的不適合現象亟應免除。」⁶⁸中共的婦女工作，在抗戰前，因主要對象侷限於大城市的少數產業女工及蘇區部分農婦，故使其工作未具規模；至抗戰時期，中共策略路線轉變，以爭取廣大婦女群眾作為中共群眾運動的中心工作之一。為了培養適應中共動員政策的婦女幹部，女大的課程設置必然與中共的需要相結合，我們可以從女大的校歌當中看到其中精神：

我們是婦女先鋒。我們是婦女榜樣。來自不同的四面八方，在女大親愛的歡聚一堂。女大是我們的母親，比母親更慈祥。女大是我們的太陽，比太陽更光亮。要努力學習革命方法；學習理論武裝；學習職業技能；學習道德修養。我們要深入農村工廠，我們要英勇的走上戰場。一個個鍛鍊的如鐵似鋼；一個個鍛鍊的如鐵似鋼！爭取民族社會和婦女的解放！⁶⁹

女大的校歌是由王明作詞，經冼星海修改和譜曲而成。女大的課程設置，為了適應中共動員政策，必須學習「理論武裝」、「職業技能」、「道德修養」，為了「深入農村工廠」、「英勇上戰場」。在這樣一所專門培養婦女幹部的女大中，中共藉由學校教育來培養他們所需的婦女幹部。但實際上，這些婦女幹部並未能真正有軍事參與的機會，「英勇上戰場」只是口號而已，主要目的還是動員婦女「深入農村工廠」，動員廣大婦女群眾，使其應付中共在陝甘寧邊區的需要。而這樣的工作，也只能交付到被認為是婦女的自然領域的婦

⁶⁷ 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頁356。

⁶⁸ 同上註。

⁶⁹ 曹仲彬、戴茂林，《王明傳》，頁331。

女幹部的手上。

延安的教育原則，著重「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在課程內容與教學方法上，使理論與實際工作相互聯繫；注重「教學一致」，學生與教員之間，互相幫助、發展；強調「課程約而精」，課程內容採約而精的原則，糾正重量不重質的現象。⁷⁰而女大則以「理論和實踐的統一，集體學習和個人專修並重」為教學原則，注重理論和實用性的結合。在課程方面分為兩類，一類是政治理論課，即必修課。課程設置上為了適應抗戰需要，在課程方面就必須先使學員們了解抗戰建國的意義。因此，在必修課程方面特別重視政治教育，如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革命基本問題（中國問題、中共問題、三民主義）；課程設置上也為了因應陝甘寧邊區的迫切要求，課程也以符合戰地需要為重點，如：軍事教育、醫藥衛生常識；此外，為了能有效動員婦女群眾，開設了有關組織婦女方法的課程如婦女運動理論。⁷¹

另一類課程是選修課，旨在結合婦女特點和婦運需要，對學員進行專門技能的培養，包括會計、速記、縫紉、新聞、音樂、文學、戲劇、外語（英、俄、日、世界語）等課程。每位學員選修兩門，邊上課邊實習。如學新聞的到《新中華報》社去參觀和實地的學習編排校對；學師範的去教學校勤雜人員的文化課；學會計的幫學校會計算帳。此外，女大還請冼星海、吳玉章、鄭律成、肖三、丁玲等各類專家來校作報告。⁷²

在女大的課程設置中，可以看到中共仍保持了對性別角色的傳統期望，這種傳統期望在女大的課程設置中揭示的很清楚。「醫藥衛生常識」、「縫紉」、「會計」、「速記」等，向來被視為與女性實力自我形象匹配的工作。她們被認為是女性做為母親和家庭主婦的傳統角色的延伸。其中，雖然還有「軍事教育」作為她們的必修課，但實際上她們並未受到被號召進入到「男性的戰場」，畢業生並不

⁷⁰ 汪學文，〈延安教育的制度與政策〉，頁5。

⁷¹ 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中國婦女運動史：新民主主義時期〉，頁415。

⁷² 延安中國婦女社編，〈女大創始的一年間〉，頁5。

被分配做軍事服務工作。其中，可以注意到「會計」這門科目的學習，在此時期特別提出必有其需要。中共就指出「支持長期戰爭與鞏固抗日根據地的一個不可分離的工作是財政經濟工作。」⁷³1939到1941年間，中共大幅調高稅率，這既是為了應付陝甘寧邊區政府龐大的行政開支和政府各類項目的開支，也是為了對付國民黨封鎖所造成的困難。同時，中共發出關於財經工作的指示，指出「必須明白，沒有認真的財政經濟工作，我們將遇到絕大困難」。⁷⁴因為中共的財政困難，因此也特別要求在學習科目中開始重視關於財政規劃和與此相關的學習。而這份學習和工作則交由婦女來擔當，因為大多數的男性被動員上戰場，而婦女應該擔任輔助的角色。

四、動員婦女政策下的女大學員

(一) 以生產工作為生活方針

女大的校訓：「緊張的學習，艱苦的生活，高尚的道德，互助的作風。」⁷⁵這是王明在女大開學典禮上的報告中提出的。為了適應抗戰的氛圍以及陝甘寧邊區的需要，女大學員的生活工作即在以生產工作為重心的方針下進行。王明在女大開學典禮上，就提出生活與勞動並重的教育情形：

一般生活，如衣食住行等與延安其他學校沒有什麼差別，與他們一樣很堅苦；勞動，除努力於已有土地和新分土地的生產勞動外，學生們揹柴、修路、幫助燒飯、挖掘廁所等樣樣都來。⁷⁶

在抗戰環境下，女大的生活很艱苦，除了一般的學習外，還必須負擔生產和勞動。她們以班為單位，輪流參加生產一星期，每天

⁷³ 劉益濤編著，《毛澤東與延安時期精兵簡政》（西安：陝西人民教育，1993），頁28。

⁷⁴ 同上註。

⁷⁵ 延安中國婦女社編，〈王明同志在中國女子大學開學典禮上的報告〉，頁3。

⁷⁶ 同上註，頁5。

工作八小時。在生產期內，除選課外，一律停課。而參加的生產活動則以手工業為主：「縫衣做鞋、編織羊毛物、製造簡單丸藥等等，現在已經成立了縫紉廠和製鞋廠。縫紉廠裡放著八架機器。生產科的同志及工人在指導她們踏機，剪裁縫紉。」⁷⁷

1939年9月，鄧穎超在女大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婦女運動》的報告，提出了對於婦女運動和工作的一些看法：

在這抗戰的大時代中，婦女們表現了驚人成績。因此，婦女們的地位，是一天天的提高，一天天被人重視了……中國婦女不但參加了後方工作，而且受到軍事、政治訓練，同時還能在前方與敵人作鬥爭。如：杭州的婦女營，能直赴前線打仗，尤其在二期抗戰中，廣東等地的婦女都要求直接參戰，許多婦女服務團，更是做了不少的戰地工作。⁷⁸

在鄧穎超的報告中，婦女在受到軍事、政治訓練後的工作，第一，就是「直接參戰」，如杭州的婦女營、廣州婦女的要求；第二，參加「婦女服務團」，作為抗戰時期的後方工作。儘管中共不願意婦女進入戰場，還是有個別以及婦女分隊參與戰鬥的例子，它們只是抗戰時期參戰的個案，一面也可能被作為中共宣傳的一部份。對中共而言，此時期婦女對生產工作的貢獻才是最重要的。

隔年，在延安各界「三八」國際婦女紀念大會上，孟慶樹更提出了明確的工作任務：

繼續動員廣大婦女參加抗戰：即動員最廣大的婦女幫助壯丁動員、參加生產、鋤奸自衛、慰勞看護傷兵、救濟保育兒童等工作，以便堅持抗戰到底和爭取抗戰勝利。只有抗戰勝利中國婦女才能得到解放。⁷⁹

⁷⁷ 延安中國婦女社編，〈女大創始的一年間〉，頁6。

⁷⁸ 中國婦女管理幹部學院編，〈中國婦女運動文獻資料彙編1918-1949〉第1冊，頁355-356。

⁷⁹ 延安中國婦女社編，〈紀念「三八」與我們的任務〉，《中國婦女》，1卷10-11期（1940），頁8。

在孟慶樹的報告中，動員廣大婦女的目的在於「幫助壯丁動員」、「參加生產」、「鋤奸自衛」、「慰勞看護傷兵」、「救濟保育兒童」，以便爭取抗戰勝利，而只有抗戰勝利中國婦女才能得到解放。中共把抗戰勝利連結到生產工作的推行，而婦女則被鼓勵擔當保育員、贍養者，她們的職責被認為是女性做為母親和家庭主婦的傳統角色的延伸。為了建立女學校與家庭的良好關係，使女學生成為教育母嫂的主力，「反對女學生受教育後，脫離家庭與家庭對立的現象。」⁸⁰在中共的抗戰動員政策下，婦女還是必須「回到家庭」，這與早期中共黨員的反家庭傾向相違背。⁸¹

根據孟慶樹在1940年延安各界「三八」國際婦女紀念大會上的十項工作任務的報告，女大方面就組織了婦女實習團。1940年春，中央婦委和陝甘寧邊區婦聯先後從女大抽調23人參加綏德、米脂等縣婦女工作團深入農村。⁸²此外，此實習團也先後進行了孟慶樹所提的十項工作任務，我們可以從女大實習團在《中國婦女》上刊登的來信中看到：

在途中我們還做了一些工作，家庭訪問、調查人民生活、幫助老百姓醫治疾病及幫助政府解決了一些問題，並且還蒐集了一些值得討論及研究的問題……我們現住在曲子，正參加一個婦聯區及主任的討論會……我們來到慶陽已經十多天了，現在的工作是正在忙於整理組織，已經改選了五六個小組……慶陽城裡有一個女子小學，現在約有四五十個小學生。要開闢慶陽的婦女工作，同時注意加強這個女學校是非常必要的。⁸³

從資料中我們看到中央婦委和陝甘寧邊區婦聯都能先後從女大

⁸⁰ 延安中國婦女社編，〈陝甘寧邊區婦聯會第二次擴大執委會大會決議〉，《中國婦女》，2卷9期（1940），頁32。

⁸¹ 如陳獨秀、沈澤民和施存統等早期共產黨人，都有對家庭批判的論述和文章。關於早期共產黨員的反家庭傾向的探討，請參見柯臨清（Christina K. Gilmartin）著、宋少鵬譯，〈共產黨早期組織中的性別與性別政治〉，頁89-94。

⁸² 梁怡，〈延安女子大學評介〉，頁100。

⁸³ 延安中國婦女社編，〈女大實習團來信〉，《中國婦女》，2卷2期（1940），頁20-21。

動員幹部，以深入農村開展工作。中共的動員政策越來越規範化，並且朝著關於社會性別和社會背景更明確的角色分配的概念演進。農村婦女被作為動員的重要目標群體，不僅在醫療、調查方面，農村的女子學校的教育也成了這些婦女幹部的工作之一。

（二）獲得參與地方政治機會的女大幹部

除了動員婦女幹部參與生產工作和群眾工作外，中共也組織女大幹部開展婦女憲政運動。這是婦女投身女大的主要動機，也是婦女能夠在其中獲得較多自身利益的地方。孟慶樹在《怎樣開展婦女界憲政運動》中，就說到：「培養婦女參政人才與愛護婦女幹部都是不可分的。」⁸⁴可見，婦女幹部的培養，一面也是為了婦女參政人才的需要。上述她們對於婦女工作的看法都直接表現在女大幹部的社會活動當中，這也是王明在女大開學典禮中提出的教學方法：「理論和實踐的統一」，使女大的婦女幹部參加邊區政府的社會活動。1940年初，女大率先發起成立「延安各界婦女憲政促進會」，1月17日，召開了延安女界2000多人參加的成立大會。大會發出《告全國姐妹書》，將延安婦女要求參政議政、男女平等等意見公之於眾。大會選舉了延安各界婦女憲政促進會理事會。女大的孟慶樹、張琴秋、郭靖等人當選為理事。⁸⁵

同年3月6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有關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的指示中，提出在各抗日根據地建設「三三制」政權。⁸⁶根據毛澤東的「三三制」，同年12月，中共中央抽調女大高一班學員45人和其他單位的共計120人到陝甘寧邊區選舉訓練班學習。之後，女大學員多數被分配到綏、德分區下轄的5個縣，少數被分配到瓦窯堡參加政權的選舉工作。⁸⁷女大學員除了直接參與「三三制」的政權選舉工作外，還參加政權工作。1941年初，中共邊區黨委

⁸⁴ 延安中國婦女社編，〈怎樣開展婦女界憲政運動〉，《中國婦女》，1卷8期（1940），頁9。

⁸⁵ 梁怡，〈延安女子大學評介〉，頁99。

⁸⁶ 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毛澤東選集〉第2卷，頁742。

⁸⁷ 梁怡，〈延安女子大學評介〉，頁100。

決定派女幹部邵清華到安塞縣任縣長，女大高級班學員章岩、路岩、李蘊輝協助工作，分別擔任縣長辦公室秘書，民政和文教科長。⁸⁸

邊區參議會是抗戰時期陝甘寧邊區所建設的制度，參議會由人民直接選舉參議員，它是邊區各黨派，各階層全體人民的民意機關，也是各級政權的最高權力機關。1941年11月6日，邊區舉行第二屆參議會選舉，有17名婦女幹部當選為邊區參議會議員，第三屆也有7名女議員，其中兩屆當選的女參議員中，白茜就是女大的畢業學員。⁸⁹

女大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第一所專門培訓婦女幹部的學校，在兩年又兩個月的時間裡（1941年女大與陝北公學、澤東青年學校合併為延安大學），培養出近千名的婦女幹部，其中不少人成為中國共產黨和各級婦女運動的領袖。這批畢業學員中，有將近10名的部級幹部，其餘的學員中有80%的人是局級幹部。⁹⁰其中，較為著名的學員有丁雪松，曾任中國人民對外友協副會長，中國第一位女大使，1938年赴延安，在女大是高級班學員，同時又任女大校友會副主席兼俱樂部主任，擔任多屆中國共產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代表以及政協委員；侯波，她是毛澤東的私人攝影師，在女大是普通班學員，畢業後分配到中央醫院擔任護士，之後還到延安婦女合作社擔任掃盲員，即進入農村教導婦女學習的人。⁹¹董邊，1938年初到延安，之後到女大學習，1941年起任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員，擔任多屆全國婦聯書記處書記；王雲，1938年經斯諾介紹赴延安，1939年在女大工作，並在高級班學習，擔任全國婦聯第四屆書記處書記；白茜，1939年進入女大學習，1941年當選邊區參議會議員、1946年又當選第三屆參議會議員。⁹²另外，還有陶端予、陳慕

⁸⁸ 梁怡，〈延安女子大學評介〉，頁100。

⁸⁹ 西北五省區編纂領導小組，中央檔案館編，《陝甘寧抗日民主根據地》回憶錄卷，頁468。

⁹⁰ 梁怡，〈延安女子大學評介〉，頁104。

⁹¹ 侯波、徐肖冰口述；劉明銀整理，《帶翅膀的攝影機：侯波徐肖冰口述回憶錄》，頁76-85。

⁹² 西北五省區編纂領導小組，中央檔案館編，《陝甘寧抗日民主根據地》回憶錄卷，頁468。

華、張子芳等人，日後都成為中共各級婦女運動的領袖。除了上述這批女大學員外，其他我們比較熟知的還有孫炳文的女兒孫維世和她的母親、參加過一二九學生運動的彭克曾、出身重慶金融世家的康岱沙以及後來成為女作家的留日學生顏一煙、著名演員于蘭等。⁹³這批畢業於女大的幹部，分配到各省市進行工作，其中有副省長、省人大副主任、自治區副主席、省政協副主席、省委宣傳部部長、統戰部長、省顧委常委、全國總工會書記處書記、全國婦聯書記處書記等。⁹⁴

中共動員婦女參與群眾運動，主要是為了解決陝甘寧邊區戰時政治、經濟和安全等問題。雖然中共提供婦女能夠參與選舉和政治的機會，但抗戰時期民主方面的進步還是有限的。在黨與軍隊所進行的政治動員中，民主傾向一直被壓抑於次要的地位。⁹⁵當婦女在選舉和參政中得到一些權益的同時，中共對權力的壟斷也就與日俱增。實際上，婦女在政治領域內仍然遇到巨大的困難，特別是在國家政治權力的高層組織中。一般而言，參加高層政治的婦女參與決策，只能在男性權力握有者容忍的程度內。其中，還有不少女性通過與黨和政府高層領導人的婚姻，而獲得參與政治的非合法性承認。⁹⁶

五、結論

1939年國共關係交惡，又隨著國民政府的經濟封鎖，使得中共的財政收入因而銳減，但所供養的黨政軍脫產人員卻越來越多。為了解決邊區所面臨的財政困難，中共實行精兵簡政，嚴格限制脫離生產幹部的人數，提倡軍隊學校機關單位的生產節約，指派大批軍隊屯墾等。因此，從事動員和組織的工作則成了中共當前尋求穩定要解決的問題。女大創辦的動機在此，合併的主要原因也在此。

⁹³ 丁雪松口述；楊德華整理，《中國第一位女大使：丁雪松回憶錄》，頁261-264。

⁹⁴ 梁怡，〈延安女子大學評介〉，頁104。

⁹⁵ 馬克·塞爾登（Mark Selden），《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頁309。

⁹⁶ 柯臨清（Christina K. Gilmartin）著、宋少鵬譯，〈共產黨早期組織中的性別與性別政治〉，頁113。

隨著 1941 年女大與陝北公學、澤東青年學校合併為延安大學時，結束了兩年又兩個月的婦女幹部培訓，女大以培訓出近千名的婦女幹部，足夠至地方動員佔大多數的婦女群眾。

女大是為了應付陝甘寧邊區戰時的政治、經濟和安全等問題而創辦的，而動員佔大多數的婦女群眾，對於此時期的中共是至關重要的。透過這批婦女幹部深入婦女群眾中動員廣大婦女，使中共能夠獲得更廣泛的支持和力量。抗戰期間中共的動員政策，基本上仍然依循著社會性別化分工的概念，而此概念則刻畫在女大的學校體制和課程設置當中。在體制上，男性為領導主體，而婦女的工作則受到男性領導的監管；學校課程則反映了這些男性共產黨人仍舊保持了一些對性別角色的傳統期待，婦女應該作為「教子」、「助戰」等輔助者、贍養者。

然而，從婦女本身進行探討，中共的動員政策和女大學員的關係為何？什麼是那些投身女大幹部培訓的婦女的動機和期望？史明 (Nicola Spakowski) 認為，抗戰期間婦女受到愛國熱情的鼓舞，奔向中共在延安的根據地，並且試圖爭取到前線參加戰爭的機會。然而，中共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中對革命的不同傾向，形成對婦女參戰的吸納和排斥的多樣性模式。抗戰期間，中共對於婦女的參戰是採排斥性的，中共需要的不是婦女參與前線戰爭，而是需要更多的婦女群眾在後方參與生產工作，也就是男性被動員去加入八路軍和新四軍，婦女則在地方防衛和生產工作中取代男性。結果，農村婦女中的群眾工作成為中共群眾運動的一個重心，被交付到被認為是婦女的自然領域的婦女運動的手上。但知識份子很不情願的被安排去做婦女運動的幹部，因為這和她們最初能夠參戰的預想不同。

然而，婦女投身女大的動機不僅只是降伏於中共的社會性別化分工的概念，而是有其他的利益取向。這些女大幹部在畢業後，一部分將進行中共的群眾工作，一部份則有機會涉足於地方政治的參與。中共利用抗戰初期陝甘寧邊區的穩定情勢，進行的各項改革和制度，尤其是中共在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後，在陝甘寧邊區推行的選舉制，迎合了當時大多數人的意願。女大幹部中，就有在畢

業後得到參與選舉的機會，女大學員對於參政機會的獲得，這是學員們投身女大的主要動機。然而，在黨與軍隊所進行的政治動員中，民主傾向一直被壓抑於次要的地位。當婦女在選舉和參政中得到一些權益的同時，中共對權力的壟斷也就與日俱增，婦女參政的機會在中共的性別政策下仍是有限的。